

Language and Material : The Life-world of Ah-Q

Qinghua Cao
qinghuacao@hotmail.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Cao, Qinghua. . "Language and Material : The Life-world of Ah-Q."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3, (4): pp.204-21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3/iss4/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语言与物质:阿 Q 的生活世界

曹清华

摘要:鲁迅笔下的“阿 Q”形象不是某种“性质”——国民性抑或革命性——的载体,而是展现了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最底层的个体生命阿 Q,一面为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所建构、规训,并成为这个系统的维护者与实践者;一面又被这个系统塑造成了一个全然的“他者”,而遭到这个系统的驱逐乃至清除。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他者”,阿 Q 与性、姓氏、名字相关联的基本欲望、权利与位置得不到认可与保护,这个系统却步步紧逼向阿 Q 合围过来,阿 Q 的身体与精神受到无以复加的摧残。阿 Q 与外部世界一直维持着物质与物欲上的联结,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就是面对来自身外之物的围困与攻击,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扭曲的语言表达活动。

关键词:鲁迅;《阿 Q 正传》;生活世界;语言;物质

作者简介:曹清华,哲学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518060。电子邮箱:qinghuacao@hotmail.com。

Title: Language and Material: The Life-world of Ah-Q

Abstract: The image of Ah-Q in Lu Xun's writing is not a carrier of any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be it national character or revolutionary spirit—but rather embodies a unique life-world. On the one hand, the individual living being of Ah-Q, who comes from the lowest social class,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disciplined by the dominant language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he is also a maintainer and practitioner.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also shaped by this system into a complete "other", and is ultimately expelled and even eliminated by the system. As an "other", Ah-Q's basic desires, rights and social positions are not approved and protected by the system. Instead, the system relentlessly encircles Ah-Q, inflicting tremendous physical and mental damage upon him. Ah-Q's victories are a kind of radically distorted linguistic activity in the face of external encirclement and attack. As Lu Xun argued, there are no thought and "-isms" in the integral history of China, but only flashes of materialism, and Ah-Q is unable to break free from the grip of this materialistic realm.

Keywords: Lu Xun; *The Real Story of Ah-Q*; life-world; language; material

Author: Cao Qinghua,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ddress: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China. Email: qinghuacao@hotmail.com.

一个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大都视阿 Q 为某种性质的载体。然而,无论其得出的结论是国民性还是革命性,研究者们共享了一个相类似的研究框架——讨论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人物,必须回答“是什么”与“为什么”两个难题。他们认为语言表达的最重要的功能便是生产与传递某种确切

的意义,小说写作也不例外。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从繁复而多变的小说文本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稳定的意义或者性质来。本文认为,鲁迅写作阿 Q 的目的,不在于生产与传递某种确定的意义与性质,而是展示出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不是回答“是什么”与“为什么”两个难题,而是向

读者再现这个生活世界实际运作的情形。

一、“国民性”还是“革命性”?

历来的研究者都倾向于把阿Q看成某种性质的载体。其一种说法是,阿Q乃中国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的代表。1922年初,《阿Q正传》尚在连载,茅盾便在《小说月报》的“通信”栏答读者来信里断言,《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小说主人公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通信》5)同年三月,周作人写下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评论《阿Q正传》的论文。他赞同茅盾的意见,认为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1)一年后,茅盾又在《读〈呐喊〉》一文中重申,鲁迅笔下的“阿Q相”,便旨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读〈呐喊〉》3)

一个世纪以来,有关阿Q的讨论,不少研究者沿袭了茅盾与周作人的基本意见与思路。首先,阿Q承载着某种基于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与茅盾认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判断相近,还有阿Q是“中国人的缩影”(西谛49);阿Q的劣性“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许寿裳72);阿Q是“中国人身上爱面子、虚荣、麻木等负面性格的概括”(陶东风41);“阿Q就是中国”,阿Q“具有现代中国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原型意义”(张旭东5、13)等论断。也有论者推而广之,以阿Q的性格属于全人类,提出“阿Q相”“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茅盾《读〈呐喊〉》2),“阿Q不但是代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点”(许广平267)等说法。其次,在历史的维度,阿Q代表着“落后”与“过去”。茅盾强调“阿Q相”里头的“不长进”的性质;钱杏邨所谓《阿Q正传》里“藏着过去了的中国的病态的国民性”(256);立波以阿Q已经是“老Q”了,他身上凝结的是农民古国精神上的大毛病(146);张梦阳认为阿Q精神“反映了处于儿童期的人类在精神上的荒谬性”(86),等等,都取了大致上相同的角度。第三,阿Q性格拥有生理学与人种学意义上的遗传性。茅盾所说的阿Q的不长进的性质,乃“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还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苏雪林讨论阿Q时,则引“天演公

例”立论。她强调,这个公例用在阿Q的身上,却变成了劣胜优败——“当异族侵掠进来时,我们种族中间那些忠愤激烈,有节概,有血气的人,不是慷慨死敌,就是举室自焚了;而那些贪生无耻,迎合取巧之徒,反多得生存传种的机会。”(278)常被研究者用来描述阿Q性格的词语诸如“劣根性”“病根”等也都有着遗传学的含义。第四,阿Q有着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的“病态”。周作人说阿Q“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并判定这便是“中国人的最大病根”(1)。时隔半个多世纪,林毓生分析阿Q的性格时也用了类似的分析方法。他说,阿Q的卑怯、狡猾、自负和可鄙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这就使他几乎完全不能从经验中作出推断(199—200)。

而且,研究者一面阐述阿Q所承载的国民性、民族性的具体所指,另一面又从各自的角度推断其形成的原因。他们的视野所及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着眼于传统文化与旧的教育。周作人认为,阿Q是中国一切的“谱”,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结晶,阿Q承受了噩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1)。茅盾持相近的意见,认为“阿Q相”,“也就是身受数千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教育的中华国民的普遍相”。(《“阿Q相”》397)张天翼认为阿Q的见解都是“未庄文化”教育出来的,他所谓的“未庄文化”,实质上指的便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教育传统(155)。第二类归因于历史上的异族统治与奴役。苏雪林最有代表性。她认为,阿Q身上的“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的民族劣根性都是异族长久的统治所造成的。(275—279)李欧梵引许寿裳的回忆录称,鲁迅自己也认为,阿Q表现出的奴隶性,是来自中国人曾两次被野蛮的异族所奴役和迫害。(李欧梵26;许寿裳59—60)

第三类指向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的因素,代表人物有艾芜、端木蕻良等左翼作家。艾芜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的特点无疑是受孕于“被帝国主义打败,偕是以封建文明自夸的国民精神”。(166)端木蕻良则指出,在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村破产,宗法社会崩溃,拥有自主的产业活动的城市又建立不起来,人们的出路完全被阻塞,城市里迅速积聚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流浪青年,

阿Q就出现在这个人群里。(282—285)第四类,认为问题出在西方传教士身上。这一派意见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学者刘禾。她这样质疑《阿Q正传》的写作:“穿着一件‘洋布的白背心’的阿Q代表着中国国民性还是别的什么?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国民性理论与这件悲悼的背心一样也是用同样的外国材料编织出来的吗?”(67)在刘禾看来,鲁迅的阿Q形象的塑造,实质上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眼光所制约,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是西方话语入侵中国的产物。冯骥才则直截了当地说:“他(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16)

把阿Q看成某种性质的载体的另一种说法是阿Q的革命性。比较早的有周扬的论述。他说,阿Q有两条好处:一条是“要革命”,第二条是“劳动好”。(282)之后,茅盾、李何林等评论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诸如阿Q有“要求革命的愿望”(茅盾,《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11),“阿Q有革命的愿望和革命的可能性”(387),等等。阿Q身上的革命性的根源则在于他的阶级属性。蔡仪1951年有关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说,鲁迅写阿Q,是为了“教育落后的农民,叫他们抛弃精神胜利法,走向实际的革命斗争”。(39)也有研究者指出,阿Q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改革者或者革命者”的原因是他“在自身的劳动能力的意义上具有个体尊严”。(李国华 96)新近出版的汪晖的专著《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也旨在讨论阿Q身上的革命性。汪晖认为阿Q的革命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内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阿Q试图恢复一切旧时的秩序,阿Q也最终死在这个革命的手里。而重要的是另一个隐而未发的革命。这个隐而未发的革命“只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模糊的本能和直觉之中”。而鲁迅写作阿Q的目的,是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瞬间,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发人们“向下超越”——即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向着非历史的领域超越。汪著也因此把《阿Q正传》视为“中国革命时代的寓言”。(89)

二、语言的驱逐:性、姓氏与名字

视阿Q为某种性质的载体,无论得出的结论

是国民性还是革命性,^①事实上,研究者们都共享了一个相类似的研究框架,那就是讨论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人物,必须回答“是什么”与“为什么”两个难题。他们大都认为语言表达的最重要的功能便是生产与传递某种确切的意義,小说写作也不例外。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从繁复而多变的小说文本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稳定的意义或者性质来。而且,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把承载着这些意义与性质的概念与定义,与个人的立场、视野与知识背景连接了起来,一组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超越具体时空的“真相”(是什么)与“真理”(为什么)便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本文认为,鲁迅写作阿Q的目的,不在于生产与传递某种确定的意义与性质,而是展现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或者说人生境遇;^②不是回答“是什么”与“为什么”两个难题,而是向读者展现了这个生活世界实际运作的情形。这个生活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语言。我从语言入手,分析阿Q的人生境遇。首先,阿Q一面为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所建构、规训,并成为这个系统的维护者与实践者;一面又被这个系统塑造成了一个全然的“他者”,而遭到这个系统的驱逐乃至清除。

小说里对阿Q打击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一句话,便是小尼姑诅咒阿Q时所说的——“这断子绝孙的阿Q”。这是在小尼姑被阿Q欺侮以后。这一句咒骂,尽管出自任由阿Q欺侮的弱者之口,其生产出来的意义,或者说,对阿Q的心理产生的效力,却远远超过那些比阿Q更强者的对阿Q的精神与肉体的欺凌。当天晚上,阿Q回到土谷祠,这句话又在他的脑海中回响。小说写道:“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这意味着“这句话”,从白天到晚上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实际的情形应该是,在宗法社会的未庄生活的阿Q,常常听到身边的人这样议论他。“断子绝孙”是未庄的人们赋予阿Q的一个“他者”的基本身份定位。阿Q也依据这句话所隐含的对未来人生的预测,看待自己的现实处境。这句话便时刻徘徊在阿Q的意识中,挥之不去,无可回避。

“断子绝孙”这一民间咒语,可谓伤人至深。在小百姓看来,不仅因为没有家庭,没有子嗣,要遭受迫在眉睫的凄风苦雨;更重要的是,还要因为血缘延续与生命之链的中断,而煎熬在先行涌来

的对死后孤独的恐惧中。阿Q耳朵里又听到小尼姑的咒骂,便起了个念头——“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而在阿Q的思想中,这一现世处境(“断子绝孙”)与身后遭遇(没有人供一碗饭)的意义连接,却源于圣贤制造的语言表达系统。小说除了专门引用两个例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与“若敖之鬼馁而”——加以佐证,还通过小说叙述者进一步强调,“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鲁迅 第1卷 498—499)

在这个由“圣经贤传”所主导的语言表达系统中,现世的伦理秩序,所包裹的是原始的性的欲望以及对生命延续的期盼。“无后”,也就是没有“性与生育”,不仅仅意味着在社会与家族中的地位低下,意味着不道德的伦理处境,更重要的是还暗含了对死后血缘与生命中断的恐惧。孝一方面为性与生育提供了道德与伦理上的合法性与推动力,一方面也拥有消解对死亡的恐惧的心理功能。对于赵太爷们,“不孝”与“无后”这样一个伦理与生理意义上的连接,便成了他们纯粹的兽性欲望肆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于阿Q,也是他冲破道德约束(小说里所说的“礼教”)解放性的压抑的动力。在阿Q遭到小尼姑的咒骂之后,作者紧接着又巧妙地安排了这样一处情节:阿Q因为在赵家舂米,得以坐在赵家厨房里的长凳上与女仆吴妈谈闲天。吴妈告诉阿Q,“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又说,“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吴妈口中的这些发生在上等人家里的事件,前者连接的是性的欲望的放纵,后者则是生命与家族的延续,均为既有的语言系统所认可。然而,当阿Q在同样一个系统的驱动下,向吴妈下跪,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时,先是吴妈被吓跑了,秀才的“很粗的大竹杠”,很快便劈到了阿Q的头上。秀才一开始怒斥阿Q时,脱口说出的“你反了……你这……”的句子,显然来自民间,为小百姓所常用,秀才欲言又止,没有说完整,却改用官话,大骂阿Q“王八蛋”。小说写道,因为这话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阿Q格外地怕,他那“女……”的思想也没有了。(鲁迅 第1卷 501)众人眼中的“他者”阿Q的性的欲望与思想,也就这样在暴力殴打、言词辱骂与权势者的威胁下,被驱逐出了他自己所信守的语言表达系统的

保护。而阿Q作为这个系统的接受者与实践者,他的身心一如既往深陷于“无后”所连接的道德自责与对生命和血缘中断的恐惧中。

小说里,阿Q这样被驱逐的遭遇不是第一次。小说开头赵太爷不允许阿Q姓赵,也是既有的语言系统对阿Q的一次驱逐行动。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正在庆贺,阿Q借着酒力,炫耀说,他与赵太爷原来是本家,比秀才还要长三辈。第二天他便被地保叫到了赵太爷的家里,被赵太爷训斥:“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我怎么会你有你这样的本家?”阿Q只是不开口。赵太爷便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说:“你哪里配姓赵!”(鲁迅 第1卷 488)阿Q便从此无姓。姓氏记录的是垂直的家族血缘联系,是个人与外部世界建立的最初的符号联结。姓氏的确认,是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既表明个人的家族身份获得了社会认可,也让刚刚来到世间的个体生命,在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中,拥有了一个基础的位置。阿Q没有确切的姓氏,就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家庭与家族的维系。阿Q酒后与赵太爷攀本家,而且与秀才比辈分,无疑告诉读者,他也是这个关于姓氏的既有的语言系统与等级秩序的遵从者与维护者。赵太爷凭借其权势与暴力,剥夺了阿Q姓赵的资格,便把“他者”阿Q从世人共享的知识权力共同体中的这个由姓氏带来的最基础的位置上驱逐了出去。

小说《序》里还讲到——“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同样与语言相关。“姓”记录的是纵向的家族身份,“名”的意义则在于横向的社会连接。但凡个人的婚姻、财产、法律与政治等权利的声张,都以名字的文字存在为基础与媒介。每个个体均通过名字,进入既有的知识—权力系统,成为其网络中的一员。阿Q却仅仅与一个声音印象相连接,而且这个声音印象,非借助“洋字”Quei便无法记录下来。(鲁迅 第1卷 489)这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阿Q没有财产,孤身一人,寄居在土谷祠,靠打短工维持生计。阿Q所处的社会,以既有的语言系统与权力秩序为基础,所进行的所有与个人权力有关的社会实践行为,均与阿Q无关。唯一一次,阿Q与名字发生关联,是小说结尾他被判处死刑之后。这恐怕也是阿Q第一回接触文字和笔。当穿长衫的人,把笔塞到阿Q的手里,赐予阿Q文字表达的权利与机会,

阿Q兴奋异常,几乎“魂飞魄散”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阿Q特别珍惜这一次机会,希望所画出的圆圈,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阿Q艰难画就的圆圈,却是一个既有的语言系统之外的符号。(鲁迅 第1卷 524)而就是这个出自阿Q之手的非语言符号,终结了阿Q的一生,永远地把阿Q驱逐出了符号和现实领域。

三、语言的围困与精神胜利法

在这个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中,作为一名被驱逐的“他者”,阿Q与性、姓氏、名字相关联的基本欲望、权利与位置得不到认可与保护,这个系统却步步紧逼向阿Q合围过来,阿Q身体与精神受到无以复加的摧残,生命空间遭到最大限度的挤压与侵蚀,生命活力几近枯竭。

阿Q没有姓氏,也就失去了家族的荫庇;没有财产,没有住处,没有家人,也就丝毫得不到家庭的保护;没有亲朋好友,没有固定的职业,社会的善一点儿也不会到达阿Q这里。个体生命,应对陌生的外部世界,所据以自我保护的工具,流浪汉阿Q看上去一件也没有。

这个语言表达系统对阿Q的围困与压迫,首当其冲的是阿Q的肉身与意识,切入口是他身体的缺陷——头皮上的癞疮疤。阿Q可谓步步退让,却无处可退,被逼入绝境。一开始,当有人影射他这个缺陷,阿Q要么动口,要么动手,可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阿Q便不再开口,而改为怒目而视。这是他退让的第一步。当阿Q改为怒目主义以后,未庄的闲人们却愈加喜欢拿他开玩笑。阿Q只好祭起精神胜利法。说:“你还不配……”可是,闲人还没完,只顾言语撩他。最终而至于打——“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阿Q被打了,无处申诉,只好又一次使用精神胜利法。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是阿Q退让的第二步。当未庄的闲人们知道这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后,每逢揪住他的黄辫子的时候,就要先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只好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跟着对方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是阿Q退让的第三步。然而,闲人们并不放,“仍旧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鲁迅 第1卷

491—492)便这样,阿Q身心得不到任何保护,每日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迎面袭来的语言羞辱与肉体殴打中。

闲人们的口头语,看上去闪烁着即兴的狡黠,却是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的产物。人身攻击只指向弱者;儿子/老子,人/畜生/虫豸,展现的是差等的遗风。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中,鲁迅说:“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鲁迅

第7卷 81—82)在未庄游走的闲人们据以言说的语言系统,便是这里所说的,“圣贤”制造的“鬼魂”。闲人们语气果断,语义明确,毫不觉得羞愧;未庄的人们则视他们的言语为理所当然,甚至参与其间,以之为乐,背后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而且,言语表达的延伸,便是行动。言语的意义生产,以符号为手段,作用于人的意识,其对人的影响难以即时显现出来。而行动攻击人的肉身,意义的显现便十分迅速与分明——动手才彻底完成了等级秩序的建构。正因如此,赵太爷不许阿Q说自己姓赵,便要打阿Q的嘴巴;闲人们欺侮阿Q,也以听到碰头的响声为最后的目标。

事实上,阿Q、王胡、小D也都是这圣贤制造的鬼魂——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的实践者。先看阿Q遇见王胡。阿Q骂王胡为“毛虫”,王胡回敬阿Q“癞皮狗”;阿Q以为王胡要逃,抢进去就是一拳,王胡则扭住阿Q的辫子,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阿Q搬出上等人制造的谎话“君子动口不动手”来招架,王胡却不理睬,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再把他推出六尺多远,才满足地离去。还有小D。小D“在阿Q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阿Q斥小D为畜生,小D不是自认虫豸吗?小D的“谦逊”,让阿Q得寸进尺,以致扑过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之后两人互相拔着对方的辫根,又护住自己的辫根的场景,引来旁观者的一片喝彩声,便是一幅为既有的语言系统所支撑的言语与行动实践的冷酷而又荒诞的图景。(鲁迅 第1卷 504—505)

这就是既有语言系统向阿Q的合围,以及阿Q卑微的生命在这围困中的喊叫与挣扎的苦况。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赵太爷不准阿Q开口,闲人们同样要封阿Q的嘴。阿Q通过语言表达与外界交流的位

置与通道,被四周无形的与有形的手剥夺和封堵。但是,阿Q语言表达的欲求——其生命力得以伸展的最后的载体——却在顽强地生长、聚积,也一直在寻找着可能的空隙和场合,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释放出聚积的力量来。阿Q“精神胜利法”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其表达“胜利”完成了,却没有外在的接受者。其生产出的意义和效力,仅仅作用于表达的制造者自己。阿Q回缩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里,获得与体味他表达的“胜利”的愉悦——他被压抑的生命力通过这一扭曲的方式释放出来。

这便是第二章“优胜记略”里阿Q的心理得胜和自轻自贱,与第三章“续优胜记略”的向更弱者的肆虐。前面已经讲到,起先倘若有人嘲笑挖苦阿Q的“癞疮疤”,阿Q便开口甚至动手以回应,所谓“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毫不示弱。可是,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阿Q便不再开口与动手,改为怒目而视。“怒目而视”,事实上仍旧完整地完成了一次表达活动。表情符号代替了语言符号,所生产与传递的“愤怒”的意义,最终抵达了表达的接受者(未庄的闲人们)的感觉器官。

尽管如此,怒目而视却是阿Q示弱的开始。如此退让的表达方式,并不能对未庄的闲人们发生实质性的影响——阻止他们对阿Q进行人身攻击。相反,这以后,他们愈加喜欢嘲笑阿Q,侮辱阿Q,而且变本加厉,语言之外,还要动手——揪住阿Q的黄辫子,在壁上碰四五个响头。阿Q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在心里想着:“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身外的攻击,逼迫他回缩到了自我意识世界里,通过这样一种无声的扭曲的语言表达活动,在心理上制造一面自我保护的屏障。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开始。

阿Q这项无声的扭曲的语言表达活动在我压抑中完成。时间一长,便不免发出声来——下意识里,阿Q何尝不希望,他的躲藏在内心里的语言活动,也拥有身外的接受者?然而,当阿Q发出的声音,传到了未庄的闲人们的耳朵里,他们便想出了新的办法,要阻止与戏弄阿Q的语言冒犯。闲人们每揪住阿Q的黄辫子,便要阿Q对自己说“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阿Q照着说了,还改用了含义更下贱的词语,所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阿Q无奈之下,当众侮辱自己,所谓的“自轻自贱”,实际上

是一种更加扭曲的语言表达方式——闲人们让阿Q代替他们成为欺凌者(表达者),而欺凌侮辱的对象却是阿Q自己。这也是阿Q再退一步获得的又一种心理上自我保护的手段——一种更加屈辱的精神胜利法。

接下来是阿Q押牌宝赢钱以后的遭遇。阿Q赢了钱,不仅赢的钱被抢走,还糊里糊涂挨了一阵拳脚。在阿Q看来,这又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然而,与之前不同的是,赢到手的钱像印在阿Q的心里一般,实在是一时间无法把它从意识里移除——是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钱,而且阿Q确认这堆钱“是他的”,已经是他基本的权利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堆到手的洋钱,是阿Q唯一能获得的,可能对他的安全、生理及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和需要提供保护的手段。也是唯一能够帮助阿Q实现身份改变的现实物质。可以想见,阿Q日思夜想的,便是得到一堆洋钱。所以,与之前的肉体与精神遭受侮辱与欺凌相比,这一回,阿Q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的苦痛”。对付这一次的失败,阿Q又想出了新的办法——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辣辣,——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鲁迅 第1卷 494)

尽管没有遣用言语,这里进行的却仍旧是一项表达活动,一项极端扭曲的表达活动。表达的媒介(means)由动手代替了语言,表达的方式(manner)用肉体的欺凌代替了精神的伤害,表达的制造者(欺凌者)与接受者(被欺凌者)都是阿Q自己,表达生产的意义,便是阿Q脸上的“热辣辣的有些痛”。阿Q又一次,用更极端的方式,萎缩到自己的身体与精神的领域之内,获得了一个苦涩的表达的“胜利”。^③

四、“革命”与“物质”

正因此,阿Q渴望“革命”。实际上,“革命”于阿Q的好处在于,他顷刻间便获得了一个异常

开阔的语言空间——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嚷叫“造反了!造反了!”,在这“造反”的嚷叫的瞬间,阿Q的语言表达的传递渠道变得空前通畅起来。阿Q不仅拽住了一群身外的听众,瞬间把他们召唤成了接受者;他的言语活动生产出来的意义,对这些接受者也产生了迅速而显著的效力。阿Q眼下的未庄男女都流露出了“惊惧的眼光”,他们都害怕了!过去这群肆意侮辱殴打阿Q的人,已经退缩到了一个“可怜的”防御的位置。阿Q终于破天荒第一次,可以从自己惨淡营造的那个虚幻的封闭的保护壳里爬出来,昂首挺胸走进外部的世界。他所收获的内心的愉悦,小说家形容为“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鲁迅 第1卷 513)阿Q被压抑的生命本能亦抬起头来。他的内心,立即为“刀与火”这两种“物质”所充斥,鲁迅解释“刀与火”的具体所指时所说的,“纯粹的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鲁迅 第1卷 355),在阿Q的幻想中喷涌而出。^④

事实上,阿Q与外部世界一直仅维持着物质与物欲上的联结。鲁迅所谓,中国历史的整数里头,没有什么思想与主义,唯有物质的闪光。(鲁迅 第1卷 354—356)阿Q永远走不出这个物质的光圈之外。小说开头写道,阿Q只给人家做短工,所谓“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记录的就是阿Q和未庄人物质上的往来。人们忙碌的时候,便记起阿Q来,一空闲,就把阿Q忘却了——阿Q在未庄人眼中也只有物质上的意义。阿Q能参与押牌宝的赌局,也因为这一社会活动完全以物质(铜钱/角洋/大洋)为中介,以得利为目的。阿Q的“恋爱”视野里,也只有“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之类的物质的考量——所谓的“圣经贤传”也是通过物质与欲望对阿Q发生作用的。而且,在这个以物质相连接的世界里,“他者”阿Q从来便只拥有一个被攫取与被掠夺的位置。未庄赛神的晚上,阿Q押牌宝赢到手的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钱,不是昏头昏脑间,突然就不见了?阿Q向吴妈说“我和你困觉”,也是一个几近于获得“物”的目标的请求。尽管如此,却已经超出了未庄人对他的身份定位。于是,他便失去了在未庄做短工——继续维持物质利益往来——的资格。

阿Q离开了未庄,也就离开了未庄给予他的

身份与位置的安排。当他再次回到未庄的时候,未庄人便对他刮目相看,看到的仍旧是他身上闪烁的物质的光芒——手里握着的“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嘴里铿锵有力的“现钱!”的吆喝,身上穿的“新夹袄”,腰间挂着的“大搭连”——“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等等。(鲁迅

第1卷 507—508)被请进赵府,赵太爷与阿Q的对话,也同样围绕着“物质”——阿Q手上的“旧东西”——这个唯一的主题。春天的五条件明文写着,“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就因为阿Q手上的便宜货,这个条件被废了。阿Q以便宜货为媒介,再一次走进了赵家人包括赵太爷、赵太太、秀才与秀才娘子的生活中。(鲁迅 第1卷 509—511)

出于同样的原因,“革命”传入未庄,尽管带来了既有的物质/权力秩序的彻底颠覆的可能性,未庄社会以物质相连接的实质却丝毫没有改变。阿Q在大街上嚷叫一番“造反了”之后,来到赵府大门口,与赵太爷一群人之间,发生了几个回合的别开生面的语言交流。赵太爷主动迎上来要与阿Q说话:“现在……发财么?”阿Q回答说:“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赵白眼也要与阿Q搭讪,问:“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阿Q回答他说:“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当阿Q获得了语言表达的权力与位置,他与上等人赵家交流的通道也敞开了,主题仍旧只限于“物质”/“发财”。(鲁迅 第1卷 513—514)

阿Q睡梦中闪现的“革命”的刀与火并没有来,在现实的权力秩序中,他一跃而成为至高无上的攫取者与掠夺者的愿望完全落空了。“革命”转化成了一个冰冷的词语,嵌入了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当中,成为维护现存的权力秩序的一个新的符号。在这个新而旧的语言系统中,阿Q起先是遭到驱逐——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把阿Q从他的“革命述说”中赶了出来;然后便是他的身体也被抓捕捆绑成一个“物”,一个“把总”的“革命党”身份的证明材料,一个“革命成功”的能指,一个鲁迅所说的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最后一次进入未庄人们的视野。^⑤阿Q在临刑前还试图说出话来,他要最后一次向世人证明他的曾经的生命存在。他无师自通地说出了半句从来不说过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便引发出人丛中豺狼嗥叫一般的声音来。这也是阿Q一生中最末

一次与身外世界的语言交流。在看客们看来,阿Q的声音,向他们证实,阿Q不仅是他们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个被排斥的他者,现在便是作为一个“异物”(Non-Being)从他们的现实世界中也被清除了出去——阿Q的“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的叫喊,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个异物即时从他们眼中消失的快意。在阿Q看来,这喝彩声把他的眼光引向了合围过来的看客们。这些“喝彩的人们”在阿Q的思想中连接的是四年前在山脚下遇见的一只饿狼。这只饿狼与阿Q之间便是完全意义上的物与物的连接——它“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以吞噬他的生命、“吃他的肉”为最终的目的。狼的眼睛,也就是这只狼据以与他交流的工具,“又凶又怯”,却具有强大的意义传递及对象询唤的功能——“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所看到的“喝彩的人们”的眼睛,比狼的眼睛“更可怕”。

实质上,这些喝彩者的眼睛能够生产与传递意义,离不开制约与支撑着他们的社会交流活动的语言表达系统以及它所蕴含与支撑的权力机制。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才显露出“更可怕”与“又钝又锋利”的特性来。“钝”在因袭、停滞,难以改动。“锋利”则在对个体生命的围困、压迫与吞噬的野蛮与残酷。这个语言表达系统,“咀嚼了他的话”,也就吞噬了阿Q的表达活动的意义生产与传递的任何可能性;“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咬他的灵魂”,则意味着扼杀与摧毁他的肉身所包裹的精神气,他之所为人的原始的本能的生命活力。小说家让阿Q在生命的尽头,再一次向读者展现了这个把他视为“物”的生活世界的可怖面目。^⑥

注释[Notes]

① “国民性”与“革命性”的矛盾引发了诸多争论。诸如耿庸与冯雪峰以及何其芳与李希凡之间的论争的焦点都在于阿Q的性格、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否超越了具体的阶级属性。王富仁所谓“阿Q是一个超越阶级界限的思想意识特征与严格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地位特征的同构体”的论断,展现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研究者消弭这一矛盾的努力。(王富仁 44)

② 鲁迅谈《阿Q正传》的创作时,便强调他的写作旨在挖掘与展现阿Q的生活世界。他说,他所写下的是“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历的中国的人生”。(鲁迅 第7卷 82)胡塞尔阐述“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时,强调世界对于我们的

意识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生活”“一起生活”上的。他说:“无论我们通过何种方式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普遍的存在,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存在着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作为人的我’(I-the-man)与所有的我们一起,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生活(living with one another)在这个世界上,而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是因为完全通过这个‘一起生活’(living together)存在着,而对于我们的意识有效。”(Husserl 24)

③ 阿Q把自己等同于欺凌者的心理行为,实际上是“自我”(ego)为了克服身外的危险对象的威胁所带来的焦虑(anxiety)所采取的一项心理防御机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自我与防御机制》一书的第九章《与欺凌者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专门探讨了这一类心理现象。(109—116)

④ “威福,子女,玉帛”,正好对应了阿Q在幻想中加入了“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之后所出现的三个场景:其一,“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其二,“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其三,“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鲁迅,第1卷 514—515)

⑤ 黄子平在分析意识形态的功能时,有如下一段论述:“意识形态是干什么的,意识形态需要杀一两个‘不×’的人,来掩盖‘以×治天下’的不可能性。”(200)

⑥ 鲁迅小说的英文译者朱丽亚·洛弗尔(Julia Lovell)在她的《鲁迅小说全译》一书的前言里强调:“在鲁迅的伟大结尾里,读者自己,经历了长达50页的阿Q的愚昧所带来的滑稽娱乐之后,被负罪般地拽入了刑场看客的凶残的欢呼当中,被拽入野兽般的连成一气的在咬着他的灵魂的眼睛里,注视阿Q行刑仪式的恐怖。”(xxiv)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艾芜:《论阿Q》,《吃人与礼教》,孙郁、张梦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65—170。

[Ai Wu. “On Ah-Q.” *Cannibalism and Moral Norms*. Eds. Sun Yu and Zhang Mengy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165—170.]

蔡仪:《阿Q是一个农民的典型吗?》,《新建设》4.5 (1951):38—39。

[Cai, Yi. “Is Ah-Q a Typical Peasant?” *New Construction* 4.5 (1951): 38—39.]

端木蕻良:《阿Q论拾遗》,《说不尽的阿Q》,陈漱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282—297。

[Duanmu Hongliang. “A Further Study of Ah-Q.” *Unexhaustive Ah-Q*. Ed. Chen Shuyu.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282—297.]

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世纪末的鲁迅论争》,高旭

- 东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14—22。
- [Feng, Jicai. "Lu Xun's Merits and Faults." *Debates on Lu Xu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d. Gao Xudong.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1. 14—22.]
- Freud, Anna.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66.
- 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
- [Huang, Ziping. *Text and Its Discontents*. Nanjing: Yilin Press, 2020.]
- Husserl, Edmund.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李欧梵:《来自铁屋子的声音》,尹慧珉译,《鲁迅研究月刊》10(1990):21—26。
- [Lee, Leo Ou-Fan. "Voices from The Iron Room." Trans. Yin Huimin. *Luxun Research Monthly* 10(1990): 21—26.]
- 李国华:《革命与“启蒙主义”——鲁迅〈阿Q正传〉释读》,《文学评论》3(2021):88—97。
- [Li, Guohua. "Revolution and 'Enlighten-ism': On The Real Story of Ah-Q." *Literary Review* 3(2021): 88—97.]
- 李何林:《〈阿Q正传〉论析》,《说不尽的阿Q》,陈漱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374—387。
- [Li, Helin. "A Study of *The Real Story of Ah-Q*." *Unexhaustive Ah-Q*. Ed. Chen Shuyu.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374—387.]
- 立波:《谈阿Q》,《吃人与礼教》,孙郁、张梦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41—147。
- [Libo. "On Ah-Q." *Cannibalism and Moral Norms*. Eds. Sun Yu and Zhang Mengy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141—147.]
-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 [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Trans. Mu Shanpei.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Liu, Lydia He.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ovell, Julia. "Introduction."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 Ed. Julia Lovell. London: Penguin, 2009. xiii—xxxix.
-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茅盾(雁冰):《通信》,《小说月报》13.2(1922):5。
- [Mao Dun. "Correspondence." *Fiction Monthly* 13. 2 (1922): 5.]
- (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91(1923):2—3。
- [---. "Reading *Call to Arms*." *Literature Weekly* 91(1923): 2—3.]
- (玄):《“阿Q相”》,《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397—398。
- [---. "The Face of Ah-Q."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o Dun*. Vol. 19.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1. 397—398.]
-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茅盾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1—12。
- [---. "A Few Points on the Typical Character of Ah-Q."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o Dun*. Vol. 26.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6. 11—12.]
-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不尽的阿Q》,陈漱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256—259。
- [Qian, Xingcun. "The Perished Age of Ah-Q." *Unexhaustive Ah-Q*. Ed. Chen Shuyu.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256—259.]
- 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苏雪林文集》第3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274—291。
- [Su, Xuelin.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the Art of Lu Xun's Writings." *Collected Essays of Su Xuelin*. Vol. 3.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 274—291.]
- 陶东风:《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文艺理论研究》2(2019):36—48。
- [Tao, Dongfeng. "Does Lu Xun Subvert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2019): 36—48.]
-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 [Wang, Furen. *A Mirror of the China's Anti-feudal Ideological Revolution: Overview of Studies on Call to Arms and Wandering*.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 [Wang, Hui. *Six Moments in Ah-Q's Lif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西谛(郑振铎):《〈呐喊〉》,《文学周报》4. 251(1926): 48—50。

[Xi Di. “Call to Arms.” Literature Weekly 4. 251(1926): 48—50.]

许广平:《〈阿 Q 正传〉上演》,《说不尽的阿 Q》,陈漱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年。267—279。

[Xu, Guangping. “The Real Story of Ah-Q on the Stage.” Unexhaustive Ah-Q. Ed. Chen Shuyu.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267—279.]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

[Xu, Shouchang. The Person I Know Called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张梦阳:《论阿 Q 的精神反思意义》,《文学评论》3(2021):78—87。

[Zhang, Mengyang. “A Study of Ah-Q’s Meaning of Spiritual Reflection.” Literary Review 3(2021): 78—87.]

张天翼:《论〈阿 Q 正传〉》,《吃人与礼教》,孙郁、张梦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148—164。

[Zhang, Tianyi. “A Study of The Real Story of Ah-Q.” Cannibalism and Moral Norms. Eds. Sun Yu and Zhang Mengy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148—164.]

张旭东:《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 Q 正传〉》,《鲁迅研究月刊》1(2009):4—20。

[Zhang, Xudong. “A Debate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ism: A Re-Reading of The Real Story of Ah-Q.” Luxun Research Monthly 1(2009): 4—20.]

周作人(仲密):《〈阿 Q 正传〉》,《晨报副刊》1922 年 3 月 19 日第 1 版。

[Zhou, Zuoren. “The Real Story of Ah-Q.” Morning Mews Supplement 19 March 1922.]

周扬:《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周扬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282。

[Zhou, Yang. “A Speech on the Film A Biography of Lu Xun.” Collected Essays of Zhou Yang. Vol. 3. Beijing: People’s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1990. 282.]

(责任编辑:张 均)

